

从诗文中，管窥苏轼与章惇的精神交集

□本报记者 邱冬勇

□杨思浩 狄建江

方丈仙人出渺茫，高情犹爱水云乡。
功名谁使连三捷，身世何缘得两忘。
早岁归休心共在，他年相见话偏长。
只因未报君恩重，清梦时时到玉堂。

——苏轼《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》之一

君方阳羨卜新居，我亦吴门旧旧庐。
身外浮云轻士苴，眼前陈迹付蓬蓊。
湖声山色苍云上，花影溪光墨画徐。
他日扁舟约来往，共将诗酒狎樵渔。

——章惇《寄苏子瞻》

嘉祐二年(1057)的汴京春闹，一场关乎北宋朝局走势的国家抡才大典正在举行。主考官是名震天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。年仅十七岁的建州浦城人章衡高中状元，而他二十四岁的堂叔章惇却在榜单上发现自己屈居晚辈之后。

章惇(1035年—1106年)，字子厚，建州浦城人，章仔钧六世孙，生于簪缨世家。

嘉祐二年，这个身着青衫的浦城士子因耻于名次在侄子之后，当众放弃敕书，转身拂袖而去。同年登科的苏轼，当时尚不知晓，这位性格刚烈的青年，将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复杂的知己——他们的友情如“冰炭同炉”，在北宋政坛的烈焰与寒冬中反复淬炼，最终在历史长河里凝结成独特的精神晶体。

青衫载酒的少年游

章惇自幼才智出众，博学善文，却有着与生俱来的骄傲。嘉祐四年(1059)，章惇再次应考，名列第一甲第五名，进士及第，被授予商洛县令。这段曲折的科举经历，恰似他一生跌宕的隐喻——宁折不弯的性格，既成就了他的功业，也埋下了祸患的伏笔。

二人一见如故，倾心相交。对此事，苏轼《与章子厚参政二首》写道：“轼初见公长安，则语相识，云，子厚奇伟绝世，自是一代异人。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。”在苏轼看来，比自己年长两岁的章惇“奇伟绝世”，且对功名利禄不甚热衷。而苏轼一生都以陶渊明为偶像，盼望着能够“采菊东篱下”。二人都有归隐山林之志，相互之间引为知己。

两年后的嘉祐六年(1061)，苏轼授大理评事，以京官充任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。两人初为官，都在今陕西一带任职，有相邻之便，过从甚密。曾慥《高斋漫录》说：“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，章子厚为商州令……二人相得甚欢。”

在凤翔任职期间，章惇与苏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他们曾同舟涉颍水，在水光山色间纵论古今；也曾共登山游潭，于悬崖峭壁上题字明志。有一日，章惇敞着肚皮躺在那儿休息，正巧苏轼从外面进来。章惇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并问苏轼，自己的肚子里都装着些什么呀？苏轼笑着答道：装的全是些要谋反的家当呗。章惇听了，当即哈哈大笑。

二人在山寺小饮，已经进入微醺状态。听闻有老虎下山，二人都勒马前往观望。在距离老虎几十米处，马已经吓得不敢向前。苏轼认为马受惊不敢往前，劝说章惇还是一起回去吧。章惇并不害怕，仍继续策马前行。到了近处，章惇取一铜锣，“哐当哐当”猛敲，老虎被吓得逃窜。归来后，章惇说苏轼胆子小啊，将来肯定不如章惇自己。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章惇的：“归谓子瞻曰：‘子定不如我！’”

最令人津津乐道的，是他们同游南山的往事。初春时节，苏轼与章惇相携游南山古刹，行至仙游潭时，眼前景象令二人驻足。这里两岸双峰如剑，劈出一道深不见底的峡谷，谷底岚气翻腾，望去竟让人头晕目眩。唯有一根独木横亘其间，风吹过便微微颤栗，稍一低头，万丈深渊近在眼前，寒意直透骨髓。章惇笑着示意苏轼过桥题字，苏轼望着桥下翻滚的雾气，只觉两股战战，指尖发凉，不敢举步。反观章惇，却神色泰然，抬脚便踏上独木桥，稳稳走到对岸。他随手扯过崖边藤蔓，拧成粗绳，一头牢牢系在老树枝干上，另一头紧紧缠在腰间。借着绳索的牵引，他脚踩崖壁缝隙，猿猴般上下攀爬，丝毫不见惧色。等找到一处平整石壁，章惇以浓墨饱蘸笔锋，挥毫写下“苏轼章某来”六字，笔力遒劲，仿佛全然不顾身下的险境。

回到岸边后，苏轼走上前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背，轻声叹道：“子厚，你日后必能杀人。”章惇闻言一怔，挑眉问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苏轼望着方才他攀援的崖壁，缓缓说道：“连自己性命都能豁出去的人，自然也有胆量对他人下手。”章惇听罢朗声大笑，只当是好友间的戏语，并未放在心上。章惇的果敢奇绝与苏轼的通达风趣，在山水间形成奇妙的平衡。

朝堂分野的冰与火

熙宁二年(1069)，王安石推行新法，北宋政坛分裂为新旧两党。章惇凭借出众的才干得到王安石赏识，任编修三司条例官，成为变法核心人物。制置三司条例司，是王安石为推动变法设立的政策制定机构。而苏轼则因反对新法的弊端，逐渐成为旧党重要代表。政治立场的分歧，并未立刻“冻结”他们的友情，反而在北宋的政坛上，上演了一场“君子之交和而不同”友谊佳话。

章惇在变法中的表现堪称能臣。他察访荆湖北路时，招抚梅山蛮人一万四千八百户，得田二十六万余亩，设置安化县稳固边疆。元丰年间，他平定西南叛乱，设立靖州、诚州，将版图向南拓展。这些政绩背后，是他“果敢率直，敢于发言，勇于任事”的执政风格。

熙宁八年(1075)，章惇遭邓绾弹劾，称其“与吕惠卿协济为奸”，他也因此被贬往湖州任职。到达湖州后，章

惇回想起早年与苏轼一同游历的过往，遂作《寄苏子瞻》一诗，抒发了自己渴望归隐田园、寄情山水的心境。苏轼见诗后，随即以《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》相和应，诗作中更不乏对章惇的勉励之词。

时运轮转，元丰二年(1079)七月，苏轼深陷“乌台诗案”，宰相王珪等人欲置苏轼于死地。当时苏轼因为反对章惇榷盐开边以及新政变法，已经与其不和了。但章惇并没有因此置好友不顾，知道苏轼深陷险境，依旧冒着政治风险，勉力为苏轼辩护。

周紫芝在《太仓稊米集》中记载章惇为苏轼辩解道：“(苏)轼十九擢进士第，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，擢为第一，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，今反置在圜圜，臣恐后世谓陛下听谗言而恶直言。”

史料记载，退朝后，章惇继续质问王珪是不是想让苏轼家破人亡？王珪推脱称是舒宣(“乌台诗案”的始作俑者之一)说的。章惇反唇相讥：舒宣的口水难道也可以吃吗？

在章惇等一干大臣的争取下，苏轼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，最终被贬黄州。

“乌台诗案”是宋代著名的文字狱。苏轼落魄，大家唯恐避之不及，更没有人敢给他写信。只有章惇，不仅不计前嫌，还寄信慰问。苏轼回信道：“轼自得罪以来，不敢复与人事，虽骨肉至亲，未肯有一字往来。忽蒙赐书，存问甚厚，忧爱深切，感叹不可言也。”

朝局波谲云诡，元丰八年(1085)三月，宋神宗赵顼驾崩，年幼的哲宗皇帝赵煦继承大统，赵煦的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。宣仁太后陆续起用一批旧党大臣，当时能言善辩的章惇俨然成为新旧两党矛盾的激发点。据《宋史纪事本末》记载，“(章惇)会与司马光争辩役法于太后帘前，其语甚悍。太后怒，斥知汝州。”

而苏轼因曾经反对变法，受到司马光等“旧党”的重用，此时擢升为翰林学士。虽然二人政见不合，但苏轼依然写下《归安丘园帖》安慰被贬的章惇：“前日少致区区，重烦海客，且审台侯康胜，感慰兼极。”这封信于元祐元年(1087)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原件至今仍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尺牍间的温情，与朝堂上的纷争形成鲜明对比。

宣仁太后驾崩后，哲宗亲政，改元绍圣，章惇被再次起用，加左正义大夫，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逐步恢复了元祐年间被废除的新法，史称“绍圣绍述”。他废除司马光、吕公著的赠谥，将旧党官员纷纷贬谪岭南。苏轼作为“元祐党人”中的“蜀党”领袖，首当其冲，从定州一路被贬至惠州、儋州。

根据现代部分学者的观点，章惇在这时期对“元祐诸臣”的打击，更多是政治立场的交锋而非私人恩怨。在某些层面，章惇和王安石一样，有些“执拗”和“单纯”。章惇曾说：“元祐诸臣，皆负先帝。”在他眼中，维护新法就是对神宗的忠诚。但历史总喜欢开玩笑，崇宁三年(1104)，由章惇的政敌蔡京主导炮制的“元祐奸党”名单，章惇竟然名列其中……

绍圣四年(1097)，六十二岁的苏轼踏上前往儋州的漫漫长途。此时的苏轼和章惇，一个在天涯海角教书育人，培养出海南岛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；一个在权力中心推行新政，主持收复西北故土。二人看似渐行渐远，实则仍以独特的方式相互映照。

章惇主持编订《常平免役敕令》等国家政策，完善新法体系，修正元祐以来“尽废新法”的弊端。对外采取强硬态度，派章鞏进攻西夏，三战三捷，西夏震动，此后数十年“不复能军”；又征服吐蕃，收复青唐(今青海省西宁市)，将大片领土纳入宋朝版图，达到北宋中后期拓边运动的高潮。

军事上的胜利与制度上的完善，使宋朝国力一度回升。在章惇的主持下，王安石罢相之后一度废弛的“熙宁新政”基本恢复，冗官(官僚体系臃肿)、冗兵(军队数量庞大但战斗力低下)、冗费(财政支出过度)等诸多沉痾得以缓解。

但章惇的强硬也引来了非议，尤其是反对立端王(即后来的宋徽宗)为帝。他当着太后的面说：“端王轻佻，不可以君天下。”被有心之人抓住把柄，为自己埋下了祸根。

元符三年(1100)，哲宗驾崩，徽宗即位。章惇因反对赵佶当皇帝，被贬雷州，与苏轼当年的境遇惊人相似。命运仿佛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：两位老友最终都成了岭南的逐客。

天涯对望的晚年心

世事轮回，常有出人意料交集。章惇之子章援，素爱读书，文才颇佳。元祐三年(1088)，章援赴考，时任主考官的正是苏轼。苏轼阅卷后对其大为赞赏，名列榜首，揭榜后方知，这位榜首竟是章惇之子。章惇的另一个儿子章持，也在同科考中进士。

徽宗即位之初，苏轼结束贬谪，渡海北还。行至京口(今江苏省镇江市)时，恰巧章援也在此地。这本该是师生相见的良机，可章援念及父亲章惇与苏轼的政见分歧，担忧苏轼若重返朝堂或许会对父亲不利，踌躇不定，终究不敢登门拜见恩师，只写下一封七百多字的书信，倾诉“未见长者，是为有罪，况于不克见者乎？逡巡犹豫，事为老父，固当审思”的复杂心绪，托人转交给苏轼。

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苏轼早已参透世事，见信后对儿子苏过说道：“斯文，司马子长之流也。”对章援的文采给予极高评价。苏轼全无芥蒂，给章援写了回信，信中细数与章惇四十年的友情：“某与丞相相交四十余年，虽中间出处稍异，交情固无所增损也。闻其高年，寄迹海隅，此怀可知。”丝毫没有要找章惇麻烦的意思。

苏轼还写道：“以往更说何益，惟论其未然者而已。”信中，苏轼还提醒章援兄弟在外远行需多备常用药物，又嘱托他们转告章惇保重身体。此外，他还附上自己所作的《续养生论》一文与数个养生药方，盼章惇能颐养身心，静待归期。字里行间言辞恳切，关怀备至，尽显长者风范。

建中靖国元年(1101)，苏轼北归途中得知章惇被贬，非但没有幸灾乐祸，反而写信给章惇家人，劝慰章惇家人无需过分担心，雷州虽远，却没有瘴疫。这份超越政治恩怨的关怀，展现了友情最本真的底色。

崇宁四年(1105)，章惇再被贬为越州团练副使，迁湖州团练副使。1106年，章惇在贬所逝世，享年七十一岁。

历史迷雾中的真性情

章惇身后，长期笼罩在“奸臣”的历史迷雾中。《宋史》评价其“性残忍，无所忌憚”。这种评价源于新旧党争的余波，也与他强硬的执政风格有关。但有学者指出，章惇主政期间“无明显失误之处”，其开疆拓土、完善新法的功绩不应被忽视。

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《宋论》中曾这样评价章惇：“迄于今日，其所建之州县，存者犹在目也；其沿之以设，若城步、天柱诸邑之棋布者，抑在焉也。……其功溥，其德正，其仁大矣！”

梁启超在《王安石传》中评价章惇：“有才而负气之人也，奸则吾不知也。”他认为元朝编纂《宋史》时“不能别择史料之真伪”，全盘否定王安石及其新法，导致章惇等新党人物被污蔑。梁启超还指出，章惇驱逐元祐诸臣，则亦还以元祐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。元祐诸臣是，则惇亦是也；惇非，则元祐诸臣亦非也。”

苏轼对章惇的评价则更为复杂。他既曾批评章惇的政策，又在《答子厚书》中称其“奇伟绝世，自是一代异人”。这种矛盾恰是两人关系的写照：政治上的对手，精神上的知己。他们就像北宋文化天空中的“双子星”，虽轨迹不同，却都以各自的方式照亮了那个时代。

建中靖国元年(1101)七月二十八日，苏轼在常州病逝。临终前，他嘱托胞弟苏辙撰写墓志铭。苏辙在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中宣称章惇为苏轼“旧善”：“公旧善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，二人冰炭不相入。子厚厚以谄侮因君实，君实苦之，求助于公……君实赖以少安。”不善言辞的司马光，言语犀利的章惇，还有费尽心力从中斡旋的苏东坡，都在苏辙笔下娓娓道来……

当年唇枪舌剑的朝堂之争，早已随着北宋灭亡而烟消云散。但章惇和苏轼的友谊，经由苏轼的诗文和苏辙撰写的墓志铭流传至今。章惇与苏轼的友情，超越了政见分歧与世俗评价，在北宋党争的残酷背景下，绽放出人性的光辉。这种“冰炭同炉”的情谊告诉我们：真正的大水口村，详解了解村文化礼堂建设情况，走访大水口“无忧花谷”景区，了解乡村旅游发展现状。

正如章惇在《寄苏子瞻》中所咏：“他日扁舟约来往，共将诗酒狎樵渔。”那份闲适与不羁，既是对友人的期许，也是对自己一生的注解。

《朱子家训》的“老理儿”与新说

“延平四贤”又称“闽学四贤”(杨时、罗从彦、李侗、朱熹)，如同闽地文化星空中最明亮的星辰。其中朱熹集理学之大成，被后世尊为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宗师。他所著的《朱子家训》虽仅寥寥数百字，却在千年之后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为当代人的立身处世提供着温暖的指引。

朱熹承袭了杨时、罗从彦、李侗等先贤的理学思想，系统总结并创新性地发展了儒家学说，创立了影响深远的程朱理学。近年来，朱子文化研究焕发出新的生机。2024年，在南平市举办的朱子文化系列活动，让更多人有幸近距离感受这位先贤的思想魅力。

朱熹《朱子家训》作为传统家训文化的瑰宝，其价值在今日愈发彰显。《朱子家训》中“诗书不可不读，礼义不可不知，子孙不可不教”等智慧在提醒我们：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家庭教育的温度与深度，始终关乎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未来。

翻开《朱子家训》，我们仿佛听见一位智者娓娓道来的真谛。对于父母，他主张“慈”“教”并重——父母对子女的爱要恰到好处，既不能缺少温暖，也不能流于溺爱。对于子女，他强调真心实意的“孝”——不仅要奉养父母，更要给予精神上的关怀与尊重。夫妻之间，他倡导“和”与“柔”——相互体谅、温和相待。兄弟之间，他讲究“友”与“恭”——友爱互助，和睦相处。这些朴素的家常道理，至今依然散发着力人性的温度。

走出家庭，步入社会，《朱子家训》的智慧依然相伴左右。“慎勿谈人之短，切莫矜己之长”，教导我们保持谦逊的美德；“人有小过，含容而忍之”，提醒我们常怀宽容之心；“仇者以义解之，怨者以直报之”，启迪我们以理性化解矛盾。这些处世之道，如同一位循循善诱的师长，在人生的各个路口为我们指点迷津。

最令人感动的是，《朱子家训》将道德修养比作“衣服之于身体，饮食之于口腹”，认为品德是每个人每天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。“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”的谆谆告诫，如同春雨润物，在细微处塑造着人的品格。这种对善的执着追求，恰如孟子所言：“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。”相信善良是人性中最自然的本真。

如今，当我们重读《朱子家训》，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智慧并未因时光流逝而褪色。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人们。

文化资讯



日前，由南平市直机关工委、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，市“文图博”公共文化服务联盟承办的“迎中秋·庆国庆”主题活动在市图书馆举行。活动巧妙地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传统文​​化体验相融合，让孩子们通过阅读爱国主义绘本、制作国庆主题拓印团扇，以及参与投壶等传统游戏，感受中秋、国庆“双节”氛围，将家国情怀深植于心。(林梦琳 王伟 叶丽君 摄)

浦城：

文化特派员点燃乡村文化火种

本报讯(柯聪)夜幕降临，浦城县万安乡大游村的村部广场渐渐热闹起来。几盏路灯照亮这片平日用于晒谷的场地，村民们陆续聚集，老人摇着蒲扇，妇女怀抱着孩子，儿童在光影间嬉戏追逐……

近日，浦城县赣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的演员吴永荣和同事们一起，用红毯和桌椅搭起临时戏台，为大游村民带来一场公益性赣剧演出。锣鼓声响起，赣韵古调回荡在村庄夜空，观众随剧情时而凝神，时而欢笑感叹。吴永荣说，除了送戏下乡，他还计划在村里开展戏剧艺术培训，培育农村文艺骨干。

自今年下半年开始，吴永荣有了一个新身份，他被选派为大游村县级文化特派员。据悉，今年7月，浦城县启动首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工作，35名来自基层的文化业务骨干分赴农村，开展为期两年的选派服务。其间，他们将发挥宣传政策、传播文化、带动创新等优势，为乡村振兴发展和文化项目建设出谋划策。

“山路村是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，我们村在这方面有哪些特色？”近日，浦城县富岭镇山路村文化特派员柳志勇到村里，挖掘该村传统古村落文化元素，并建议村里把独特的姓氏文化、古建筑文化、红色文化、古码头文化等在村文化大礼堂集中展示。

“我们村的文化礼堂准备如何布局，还存在哪些困难？”富岭镇大水口村文化特派员左贤斌，日前来到大水口村，详细了解村文化礼堂建设情况，走访大水口“无忧花谷”景区，了解乡村旅游发展现状。

截至目前，浦城县首批文化特派员已全面启动走访村民，深入了解村情、挖掘乡村特色文化及指导文化项目建设等工作。